

# 福州马江昭忠祠档案底稿现世 藏着怎样的中国近代海军史?

□王国平

人文历史



66

9月17日,是中日甲午海战127周年纪念日。当天,在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源地——福州马尾的马江昭忠祠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。

在这次活动中,一份《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》底稿的出现,让残缺半个多世纪的重修马江昭忠祠碑文,首次得以全文亮相。

马江昭忠祠原本祭祀的是甲申中法马江之战的殉国烈士。这份墓记背后,是一段关乎战争、为国、忠勇、祭祀的中国近代海军历史,凝结的是中国近代海军向海图强的精神历程。

从民国海军档案中发现的碑文底稿,补全了历史,填补了昭忠祠直接档案的空白。

补全历史 注入生动鲜明的文化内涵

2020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、工作节奏。笔者在居家办公的日子里,受到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和陈兆鏞嫡长孙的委托,写一篇《陈兆鏞传略》。

陈兆鏞如今知名度并不高,但放在百年前,他不仅是中国海军界的元老,更是海军的柱石。他毕业于船政学堂的管轮班,甲午海战时,任旗舰定远号的大管轮;清末重建海军时,连续担任数艘新舰的总管轮,让古老帝国舰队焕发最后的荣光;民国时期,他先主持江南造船所,为该所承造美国万吨轮船奠定了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;后任福州船政局局长,整顿教育为中国海军输送了大批人才,更重要的是,为中国飞机制造工业的开创奠定了基础。

陈兆鏞的海军生涯从进入船政学堂算起,有50年,其中二十多年是在军舰上度过;在北洋海军将领中,他和老友萨镇冰等是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少数几人。他们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(海军)历史的缩影。陈兆鏞所做的贡献,正如其族兄陈宝琛所评价:“临难见风义,潜危积劳勋。”

由于清末、民国时代战乱频仍,包括陈兆鏞在内的早期海军官员原始履历档案大多佚失不可考。

为了寻找陈兆鏞资料,我们专访了他的后裔,在北京、南京、天津、上海乃至海峡对岸的图书馆、档案馆等机构爬梳各类文献。使陈兆鏞的人生轨迹如拼图一样,逐渐展现。

为了更好地发掘近代海军历史,去年6月,封面新闻和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合作成立“中国近代海军口述历史研究中心”,旨在寻找近现代海军后裔以及实地遗址访查、遗物寻访,推动近代海军研究的深化和海洋文化的普及。

这份《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》,正是中心成立后,联合海峡两岸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从中国台湾找到的重要成果之一。

笔者曾多次去船政局的遗址,也曾几次到马江昭忠祠瞻仰。如今祠内保存有四块重要碑刻,均为国家三级文物——1886年特建昭忠祠碑、1920年重修墓记碑、1922年申午合祀碑、1922年重修捐款名录碑。

四碑之中,1920年重修墓记碑仅存半部。这篇碑文记录了昭忠祠重修过程,原本刻石两块,镶嵌在昭忠祠中的墙壁上,可惜第一块碑已毁,后世留存墓记文字只有后半块内容。

此次,笔者借着书写陈兆鏞史实的机会,终于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全文。这对石碑,也终于有机会“完璧”。

陈悦说,这不仅填补了昭忠祠直接档案的空白,更为昭忠祠注入生动鲜明的文化内涵。



9月17日,《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》首次“重回”马江昭忠祠。 陈悦供图

残缺半个多世纪的碑文,首次得以全文出现。 王晓霞 摄

重修背后「以表风烈而励忠节」

在陈兆鏞《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》背后,是一段悲怆的中国近代海军史。

1884年8月23日(光绪十年七月初三)中午,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爆发。战争仅持续约半小时,福建船政水师就几乎全军覆没。据战后不完全统计,福建水师阵亡将士达736人。马江海战结束后,闽江沿岸军民自发组织打捞阵亡福建水师将士的遗体,除被家属认领的,剩下的五百多具遗体沿江分九冢掩埋,冢前各立“忠冢”石碑。

1885年(光绪十一年)1月8日,署理船政大臣张佩纶奏请清廷敕建昭忠祠。同年12月,清廷准奏,新任船政大臣裴荫森主持建造,“既度地分瘞忠骸,乃鸠工庀材,建祠于马尾山之麓。”

辛亥鼎革后,清廷在各地建造的昭忠祠不同程度地遭到废弃或改用,马江昭忠祠也不例外。

1915年,陈兆鏞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。此时进入民国仅仅4年时间,陈兆鏞看到的马江昭忠祠已是一片残垣断壁,院内“狐兔为穴,牛羊以当,使人不可忍视”。

1918年,时任海军总司令蓝建枢到马尾校阅舰队,在陈兆鏞的陪同下,专门拜谒了马江昭忠祠,他发现祠堂规模狭隘且“上雨旁风”。

蓝建枢,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三届毕业生。甲申海战殉国人员中,很多是蓝建枢和陈兆鏞的船政同学。因此陈兆鏞说这次祭拜“既怀先烈,又念同学。”当看到祠堂破败的光景,两人十分感慨,重修昭忠祠的想法不谋而合,并在1920年付诸行动。

因需款较巨,便广为募集。陈兆鏞“首捐俸钱”,各界听闻,

也捐款踊跃。1920年,蓝建枢向海军部呈文,希望修建完成时大总统能颁给匾额,以昭郑重。

在这封呈文后的半个月,马江昭忠祠重修之前,蓝建枢这位甲午战争时曾任“镇中”炮舰管带的海军总司令,又联名8位海军重要主官,提议将甲午死难将士入祀马江昭忠祠。

蓝建枢等人这一动议,源于当年海军部的编史行动。因要编撰甲申、甲午两战的“海军战纪”,其中涉及两次海战海军殉难人员名单。因甲午海战“将士请恤卷牍,叠经兵燹,荡然无存”。1918年10月开始,海军部下令在舰队诸人中征集甲午海战死难人员名录。

联名的9人中,7人曾参加过中日甲午之战,经历过战友、同学在身边倒下的痛苦,也发出过北洋舰队最后覆没时的哀叹。民国后,他们也在为海军振兴而奋力。

最初蓝建枢在文中写的是“商同兆鏞、锡珪”,落款也是蓝建枢、陈兆鏞、杜锡珪(时任第二舰队司令)三人。显然,蓝建枢和陈兆鏞、杜锡珪最先就甲午死难将士入祀一事达成一致,并开始了推动工作。

这件联名呈文写道:“我国海军自兴创以来,甲申中法、甲午中日两役,实为沉痛之历史,而我国人所永永弗忘者也。”甲申之役后,因朝廷敕建马江昭忠祠,死难人员得以“岁时致祭,垂危常典,而甲午一役尚付阙如。”

“夫事迹昭垂所以彰信使,而馨祀事尤以妥亡灵,二者未容偏废也。”因此“恳请大总统乞将甲午一役死难将士姓名并祀于马尾之昭忠祠”,“以表风烈而励忠节”。

当时9人还提议,合祀后,将马江昭忠祠改名为“海军昭忠祠”。

不朽之地 中国唯一近代海军纪念专祠

蓝建枢、陈兆鏞等人的联名呈文递交后,当时的海军内部人士想起,前清时曾在天津建有一所北洋海军昭忠祠。1920年4月6日,蓝建枢、陈兆鏞等9人再次呈请海军部咨行直隶长官收回基地,以便奉祀。

因海军部在推动对天津海军昭忠祠的调查和回收工作,已经募捐而来的善款,仍然用于对马江昭忠祠的修葺。此项工程由陈兆鏞亲自主持,他对昭忠祠做了整体规划,几乎相当于重新修建。

此项工程首先重建了甲申海战烈士的墓地,“昔分九垄,今聚一邱”:从九个坟墓里分别收殓英烈尸骨,一起葬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墓中。墓内尸骨分前、中、后三排,每排又分上、中、下三层。墓前立近两米高、半米多宽的花岗岩墓碑,上刻“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”。陈兆鏞还十分注意细节,用舰船铁板制成一座碑亭,以此为英烈遮风挡雨。

陈兆鏞还主持重修了祠堂建筑,“俨然崇堂,蜿蜒修廊,重门屹壙,顿易旧观”;并在东侧加盖一座二层小楼,“以供游眺,有所延恋,则可慰荒寂”;“更拓地植果木,储为祠产”。整个工程历时近五个月。

1920年8月,重修工程完成后,陈兆鏞提笔写下《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》。在墓记的开篇,陈兆鏞从汉高祖祭祀战死者讲起,指出“为国效死者,必□其千秋万岁后,仍立于不朽之地。”他在文中最后写道:“中法之役,以对内而言,则为以一姓效力;以对外而言,则为一国效力。夫使身履其间,一挫其锋,而恒挠脆怯,颠蹶窜踣,乞为囚虏之不暇,则负于一姓其罪小,负于一国其罪大,国家何贵有此人哉!而诸先烈只知有国,不知有身,虽捐糜顶踵,在所不恤。浩然正气,如日星河岳,历劫不磨,然则万古纲常,岂与一姓同兴废耶。”

这一段话,慷慨昂扬,立意深远,将甲申烈士的奋战置于国家、民族之中。陈兆鏞希望,后人能以此心纪念海战烈士。

碑记的落款写着“长船政事后学陈兆鏞谨识”,这是陈兆鏞表达对船政事业的传承之念,也是在前辈面前的谦虚之情。

天津海军昭忠祠最后未能收回,但甲午烈士终在海军各界的推动下合祀于马江昭忠祠。1922年农历八月十八日(甲午海战爆发纪念日)下午,举行了隆重的入祀仪式。

从此,马江昭忠祠内供奉甲申、甲午殉国将士的神主和牌位,成为中国唯一的近代海军烈士纪念专祠。

学术支持: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